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5002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的“延安道路”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新闻事业的“中国化”改造, 在“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基础上, 形成了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的“延安道路”, 其在话语主体、话语渠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特色。其一, 话语主体: 具备通过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建设, 实现媒介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能力; 拥有提供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外文明融通的新闻理论的能力; 能够凭借“党的喉舌”的党报定位以及“党管媒体”“思想改造”的新闻队伍建设, 确保党的声音保真传播并扩散至乡土社会。其二, 话语渠道: 具备构建话语“割地”理性边界的能力, 以及实现话语“搭场”底层渗透的能力。其三, 话语内容: 拥有定义新闻“真实性”的能力, 以及建构“人民中心”职业伦理的能力。其四, 话语对象: 具备围绕“人民”展开论述并由此限定话语资格的能力, 以及兑现新闻宣传承诺的能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 延安道路; 话语主体; 话语渠道; 话语内容; 话语对象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5-0011-08

“Yan'a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Leadership in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YANG Haihong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the “Sinification”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and based on the unity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centeredness”, has formed the “Yan'an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eadership in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This approach exhibits distinct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discourse subjects, discourse channels, discourse content and discourse objects, etc. First, discourse subjects: The Party possesses the ability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media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leadership systems based on democratic centralism; it has the capacity to provide and interpret news theories that integrate Marxism with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nd it can ensure the faithful transmiss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Party's voice to rural societies through the positioning of Party newspapers as “mouthpieces of the Party”, as well as through the principles of “the Party managing the media” and “ideological remolding” in news team building. Second, discourse channels: The Party has 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rational boundaries for discourse “territories” and achieve deep penetration of discourse “platform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ird, discourse content: It possesses the ability to define the “authenticity” of news

收稿日期: 2025-05-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近代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研究”(23FXWB025)

作者简介: 阳海洪, 男, 湖南冷水江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电影史和影视批评。

and construct a “People-centered” professional ethics. Fourth, discourse objects: The Party has the ability to frame discussions around the “People” and thereby define discourse qualification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fulfill promises made in news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leadership in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Yan'an Path; discourse subjects; discourse channels; discourse content; discourse objects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关键事件。将乡土社会纳入革命和国家建构进程之中,无疑是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中国面临西方的殖民入侵,但一直未能将乡土社会纳入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1]511} 鉴于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况,中国在国家与社会之外,选择了以革命政党为引领力量的“政党中心”建国路径。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364} 简言之,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取向的动员型的政党,以及由该政党控制的国家权力”^[2],以统筹各方利益关切,解决皇权被推翻之后“爆炸式”的政治参与和“乌合式”的大众社会问题。简言之,动员农民支持革命,将乡土社会纳入政治过程,这既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元问题”,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议题。

农民何以支持革命?乡土社会何以卷入政治过程?革命史观将之归因于土地集中、贫富分化而带来的阶级矛盾,西方学者则从中共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农民民族主义觉醒中寻找理由^[3]。马克·赛尔登在其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经典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以“延安道路”这一概念总结中共动员农民革命的成功之道。在赛尔登那里,“延安道路”的基本内核可以归结为中共如何采用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对以农民为主体的最广大的各社会阶层进行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4],为回答中国革命“元问题”提供“洞见”。精神交往是集体行动的前提和基础,由“身处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转型为“身处于革命之中的农民”,中间必然存在着一个沟通和传播网络,才能实现革命动员的目标。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以苏维埃政权为基础,构建了“分

级动员、层层覆盖”的新闻传播体系,显示出高效的战争动员能力。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在民族统一战线框架下处理国共关系、夺取无产阶级在新闻宣传领域的领导权成为中共的优先议题。为此,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动员机制进行优化升级,使党报拥有了深度介入乡土社会的力量,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推进中构建起支撑人民战争的动员体系。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文借用“延安道路”这个概念,尝试从“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这一传播学视角,回答“农民为什么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个“元问题”。

一、话语主体:“成熟型”领导集体+“群众化”政党

近代中西交通,儒家文化面临深刻危机,凝聚民族共识的主流价值观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精英吸纳模式难以形成,国家权力日趋“碎片化”,这也是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根本性含义。融通中外文明,创建适应中国国情的新型意识形态和制度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纳入政治过程,就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新国本”^[5];而媒体的责任,则是将此“新国本”融入新闻舆论工作过程中,向全社会扩散,以赢得人们的认同和拥护。因此,在政党中心建国路径中,按照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政党,自然在传播过程中居于绝对的话语主体地位,也是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研究首先要关注的维度。

“九一八事变后,重建中心势力说演化为全社会博弈的命题。”^[6] 各种政治力量都利用媒体表达本党的建国纲领和政治主张,冀图掌握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以成为主导抗战建国的“中心势力”。“新闻媒体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还是各社会权力团体争取‘意义解释权’的意识形态战场。”^[7]

在“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域中，政党领袖的制度建构能力和理论供给能力，以及作为执行主体的新闻队伍的信息保真能力和信息扩散能力，在领导权建设中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一）领导主体：“成熟型”领导集体

1. 领导制度成熟：民主集中制制度化。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8]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制定一系列党内法规，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详细规定，并将其确立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等13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在历史淬炼中自我成长和自我革命之后，中共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2. 思想理论成熟：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9]政党领袖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是以他们能否根据所属阶级、集团的根本利益，形成具有高阐释力的理论和学说，为新闻媒体制订办报宗旨、言论方针、新闻选择和职业准则提供理论依据为标准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既要与三民主义也要与共产国际划清界限的双重难题。摆脱这双重桎梏，“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政治军事力量，最大程度地追求并实现自身利益，对中共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取胜至关紧要”^{[10]304}。面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迫切需求，毛泽东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创新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在对中国革命的全新阐释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经验和民族形式，其标志着中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独立和成熟。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中心，以“党性原则”为根本原则，对无产阶级党报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创立了中国新闻史和党报史上一种独特的报刊类型和操作模式——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

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11]，为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执行主体：“高集中化”政党

1. 新闻管理体制的“集中化”。为加强对彼此孤立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领导，中共以“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为根本方针，全面加强党对新闻宣传的一元化领导。中共中央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了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宣传委员会，并要求“各级党的组织都应设立宣传部（科或股），统一同级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12]112}，建立了以中央宣传部、边区（抗日根据地）党委宣传部、分区党委宣传部、县党委宣传部和区党委宣传科为序列的纵向管理结构和以党报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发行部和通讯员网为覆盖的横向管理体系，制订了纪律严明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强调“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12]98}，严厉约束“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3]97}。为了解党的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情况，中共创办了从中央到县一级的纵向报刊网络和覆盖各个方面的横向报刊网络，构建了全党办报的大宣传格局。截至1945年，抗日根据地中至少284个县（约占同期根据地县的55%）创办了党报，这一比例远高于同期（1944年）国民党党报数量之于国统区数量比例（约25%）^[14]。中共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强调党委要善于利用党报向群众“宣传解释各种政策，推动工作，和检查工作的进行”，并“向党报供给消息，供给文章，提供意见”^{[15]56}。依托严密的党政组织体系，党报不仅保证了中央精神在地方的保真性传播，也保证了其在乡土社会的覆盖密度和信息密度，提升了其在乡土社会的扩散能力。

2. 新闻队伍思想的“集中化”。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是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16]中共深刻意识到，知识分子是文化运行的“处理器”和新闻传播的主导性力量，但知识分子中心论的历史传统和现代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他们容易受到西方新闻观念的影

响。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由于一时还不能适应新的历史任务(建设新型国家)、社会地位(主流化)和传播场景(乡土社会),党还难以将其转化为新政权开展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的可用资源。在整风运动中,中共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同时,号召知识分子(记者)深入乡村,以报纸“与群众有无联系和联系程度如何”作为办报好坏的标准^[17],创造了从人民群众中发现劳动模范的典型报道这一宣传形式。在“知识分子工农化”(记者要学习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道德)和“工农知识分子化”(工农通讯员要提高新闻业务能力)的双向运动中,中共积极推进知识分子从“有个性的个人”向“阶级的个人”转变,在政治立场、情感倾向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建构与人民群众的“阶级同一性”,将“完全党报”理念内化为知识分子的新闻理念和职业规范,从而将党报建成真正的“党的喉舌”。

二、话语渠道:开放型的“割地”格局+渗入型的“搭场”机制

话语渠道是传受双方信息沟通的中介和权力博弈的媒介空间。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是一种以民众同意、服从为基础的软性权力,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媒介空间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在领导权建设过程中,话语主体在利用媒介“扩声”的同时,也需要适当“收声”,以倾听不同声音。从横向传播来看,中共作为话语主体,要对党报进行“话语割地”,即要从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的“公共性”“开放性”出发,“主动‘割让’部分话语领地”,在媒体上“为大众让出必要的话语空间”^{[18]125}。从纵向来,中共还要对党报进行话语“搭场”,即降低民众接触党报的“门槛”,“搭建大众自发接受媒体政治信息,主动参与议政的开放式传统媒体话语场”^{[18]125}。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媒介场域,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提供了开放包容的话语渠道,实现了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公约数”纳入党的话语场域中的目标。

(一)话语“割地”:“开放性”的媒介格局

1.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在统一党的声音的同时,又尊重党员民主权利,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能走出“人

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1941年7月,中宣部发出指示,要求报纸“善于使用批评的武器,表扬各种工作中的成绩,揭发其错误。但在表扬与揭发时,都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纠正那种夸大、铺张、虚伪、掩饰的恶劣作风”^{[12]116}。中共尊重新闻真实性,强调要以“实事求是”和“同志的态度”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改变“惧怕批评自己”和“惧怕批评别人”两种情形,在“合乎事实和善意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实现“有益于工作,有益于团结”的目标^{[15]73}。在这里,中共既强调舆论监督是报纸的常规性工作,也强调了批评主体要承担“实事求是”和“善意批评”的责任,以强化党报的舆论监督功能,构建防止意识形态领导权崩塌的理性边界。

2. 党外:民主协商的对话方式。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是在“官方”与“民间”、“统一”与“杂多”的对话、博弈中实现的。在树立领导权过程中,各级党组织要以民主精神与民主方法来吸引群众,要“经过群众组织的多样性,去实现党的领导的统一性,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中,又能尊重群众团体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又能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19]。在这种“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中,党报要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15]52-53},并要“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展开话语合作^{[1]683},引导他们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靠拢。

(二)话语“搭场”:互动性的办报方式

1. “一条线”的发行体制。为实现报纸“下乡”目标,中共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统筹推进发行网建设。从中央到县委设立发行部,“动员一批有发行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发行工作”,建立同战争形势相适应的“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发行网”^{[12]88}。为此,中共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1939年)、中央出版局(1941年)、中央宣传委员会(1943年)等机构,统一领导全党出版发行工作。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其发行步骤如下:报纸等出版物由边区党委发行部→分委发行部→县委发行部→区委发行科→乡府登记(重要消息作标记)→教员翻复→支部书记→党员→群众^[20]。在组建发行网过程中,中共中央将“文件”和“党报”作为基层教育的材料,要求基层党支部和党员积

极订阅、推销和发行党报。透过“支部”这一“全新政治结构”，中共构建了直插到底的“一条线”发行网络。

2. “双向性”的互动方式。为降低革命话语的接受“门槛”，中共将群众路线贯彻到新闻传播领域，提出了“群众办报”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下沉的微观传播机制，群众办报通过对“新闻文本”和“传受关系”的改造，大力推动政党（报刊）/农民的文化网络向乡村渗透。

新闻文本群众化、通俗化改造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展开的。在内容上，党报要将群众由新闻舞台的“后景”置于“前景”，提升群众生活的媒介透明度，“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15]50-51}。新闻报道要将群众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推动“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12]92}。报刊通过对媒介议题的低技术化处理，将革命理论具象化为乡土农民“听得懂”“听得进”的日常话语，建立通俗易懂、平易晓畅的大众化文风，提升革命话语的亲和力、吸引力。在传受关系改造中，中共高度重视发展工农兵通讯员，组建了地方通讯网，要求通讯员按时将地方生产生活情况写成通讯提交党报发表。基层政权创造性地运用黑板报、墙报、宣传栏、门板报等“基层媒介”^[21]，组织村民开展读报运动，并将读报工作、通讯工作与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使读报组成为能够持久的团结群众推动工作的核心”^{[12]169}。作为一种中国式的集体动员方式，群众办报的话语“搭场”方式，通过“文本”和“关系”的双重再造，将革命宣传渗透至乡土熟人社会和日常生活，强化传受双方的情感认同。

三、话语内容：利益真实的新闻真实观 + 责任本位的职业伦理观

作为一种基于信任的力量，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在本质上是基于媒体公信力的引领力和传播力。中共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在强化“事实第一性”的同时，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现代中国作为报刊的价值追求，强调将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立在新闻真实和服务人民的价值基础

之上。

（一）利益真实的新闻真实观

1. 新闻以事实为“第一性”。梁启超、徐宝璜等人开启的新闻学研究传统，多从媒体的“公共性”出发，关注报刊能否代表和影响舆论。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中，陆定一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念出发，将传统新闻学甚少讨论的新闻“真实性”作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核心问题，并由此定义“新闻”的概念：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22]155}。其厘清了唯物主义新闻观与唯心主义新闻观的界限，积极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要求记者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中，实现“报纸有机运动”，以逼近事实真相，为中央了解基层情况、制定决策方针提供信息基础。

2. 事实以抗战建国为价值追求。客观主义新闻理论认为价值是主观的，并要求将价值判断划出新闻真实领域，但事实与价值两分的客观主义显然不适合战时中国的需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团结”“民主”“进步”的价值共识基础上，“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10]12}，是正在展开的伟大事实，也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诉求和利益所在。在中共看来，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民主”路径，使得新闻舆论沦为民意表象的数字化分布、新闻真实性成为媒体牟利的“遮羞布”。作为对此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与改造，中共以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将新闻舆论工作奠基於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诉求之上，在事实和利益的关联互动中重塑新闻真实观。简言之，中共认为，新闻真实性绝不是一个止于“五要素”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基于何种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的主义，但是这个术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带有为追求集体利益而动员共同体的意义。”^{[23]219}置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报刊，要将事实真实、价值真实与利益真实统一起来，动员人们投身于民族独立的革命洪流之中。“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报刊使命之所在^{[13]55}。党报在新闻真实观上，“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底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15]51}。报纸要以能动姿态介入新闻报道之中，

改变客观主义在价值建构上消极无为的状态,通过积极引导舆论,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推动其投身民族解放洪流。

(二) 责任本位的职业伦理观

唯物主义新闻真实观建构,实现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理论由“民主”范式向“科学”范式的转换,

“以认识论,如为什么无产阶级新闻会比资产阶级新闻更真实等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替代了以‘新闻、公众意见和政策’为主要问题的‘资产阶级新闻学’”^[24]。在中共看来,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唯一真理,马克思主义才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唯一途径,其在建立起以“承诺—责任”为中轴的新型职业伦理的同时,也将客观世界纳入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系统中来。

1. 责任指向“未来”。中共以共产主义信仰的科学真理和道德权威,俯瞰大众传媒,认为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展开场所和“舞台”。现代新闻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不能代表新闻事业现代化的方向,其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裁决与引领。在中共看来,“真实性”是与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文明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代表先进文化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政党,因其革命的彻底性和理论的科学性,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新闻舆论工作,并为人民群众指明革命前途。中国共产党是“人类社会最前进的政党,所以最敢正视现实,最能讲求真理,不需要任何夸张,虚伪,武断与欺骗的宣传”^{[15]199}。

2. 责任指向“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真实观,把事实真实和利益真实统一起来,将能否尊重事实与服务人民的道德境界关联起来。在中共看来,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活动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既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和服务主体,也是判断新闻真实的权威。新闻真实绝非在采访中可以获得的纯粹事实,其必须有道德和信仰贯穿其中。“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22]158}因为只有这样的报纸,才会与人民血肉相连,才会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才会组织群众通讯员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才会“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的真相,尊重他们用书面或口头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以他们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22]158}。

四、话语对象：双重界定的话语资格 + 叠加绩效的话语动力

“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中,“人民”既是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的话语对象,也是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的权力主体。新闻事业的人民性本质,决定了新闻舆论工作话语对象、表现对象、新闻来源、报道方式、新闻内容、新闻形式等各种范畴的人民性。中共以“人民”作为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的话语对象和权力主体,从“话语资格”和“话语动力”两个向度激励民众参与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

(一) 话语资格：“阶级+民族”的人民叙述

作为言论表达权和政治参与权所体现的话语资格,是指公民享有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表达态度的权利。现代国家以“人民主权”为原则,但“人民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25],需要政治去界定与塑造。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随着国内矛盾变化和时局发展,中共在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重叠中展开人民论述,以定义“人民”的内涵及其边界。“集体身份认同依靠双重过程维持:对于定义内的群体来说,集体身份认同帮助他们给‘我们’提供边界;而对于定义之外的群体,集体身份认同将‘他们’与‘我们’区分开来。在‘朋友’、‘敌人’和‘中立者’之间划清界限,是社会分类的共同特征。”^{[23]235}在对“人民”的双重界定中,中共以民族话语界定民族统一战线范围,以求出革命最大“公约数”;又以阶级话语界定革命依靠力量和国家构成主体,从而在国家主权认同者和国家主权参与者的双重统一中赋予“人民”以话语资格。

1. 作为“统一战线”的人民叙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以民族利益和主权认同作为话语资格前提,认为“汉奸”以外的人民“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26]。在毛泽东的“新中国”想象中,新民主主义国家采取“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族统一战线形式,并保障其基本权利。总而言之,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人民论述,始终以构建民族团结的统一战线为目标,将承认国家主权、参加民族抗战作为

获得话语资格的前提，只剥夺“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的话语资格。

2. 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论述。中共在以民族话语构建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又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出发，将工农阶级作为革命力量主体和国家构成主体。在中共看来，在数量上，工农人口占绝大多数，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无论从时代语境、政治合法性以及‘兵’的实际数量上，全面抗战之后‘大众’话语中的‘兵’都已具备与‘工农’同等重要的独立概念。”^[27]从革命态度来看，工农阶级遭受多重压迫，革命意愿强烈，革命忠诚度高。“工农兵”作为人民的主体构成和民族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革命的合法性源泉和话语对象，“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28]。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工农兵”是具有革命优势地位的群体。“我们的记者，要为抗日的人民大众做事，首先为工农兵做事。”^{[15]66}“阶级性”和“民族性”重叠的人民论述，为工农兵享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等民主权利提供了“阶级偏好”的价值基础和政治保障，实现了历史主体、国家主体和新闻主体的统一。

（二）话语动力：“政治参与+经济改革”的叠加激励

近代以来，报刊的政治动员作用日益为各种政治力量所重视，而作为动员对象的“大众”，在历史嬗变中被命名为“国民”“民众”“大众”“人民”等不同表述形式，并以法律形式承认其话语资格。尽管各种言说主体都冀图通过对“大众”命名的方式，将其召唤到其“主义”的旗帜之下，但他们都只是将舆论作为意见表象和数据分布，并未能真正关切农民的利益诉求，没有实现将乡土社会纳入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目标。简言之，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虽以“同意”的主观方式为表现形态，但它并非只具备心理学意义，而是有其客观标准和效果验证的。因此，作为一种

理性表达活动，舆论既要看到其公众数量的“一致性”程度，又要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从物质利益和生产交往关系出发，把握纷繁复杂的舆论产生的现实根源与利益诉求，而不是孤立抽象地运用意见表象、数据或范畴描述舆论，将它们理解为舆论脱离实践的观念自我运动”^[29]。在“存在”决定“意识”的意识形态权力建设路径中，党报理论和新闻宣传只有来自人民并造福人民，才能为群众所认同和拥护。因此，中共倡导“言行一致”的宣传方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其政策制定和政治实践，将新闻真实和人民伦理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来。“共产党有别于其他阶级的政党，就是严格的保持言论和行动的一致。因此，我们党的宣传鼓动，是行动的，战斗的。”^{[12]104}“言行一致”，强调要在乡村治理中兑现党的意识形态承诺，将宣传鼓动工作扎根于“群众在自身的政治经验上来认识我们党的理论、政策、主张、口号的正确”^{[12]105}，激活农民参与意识形态建设、认同中共政治理念的内在动力。

1. 政治参与激励。作为现代导向的革命政党，中共深刻认识到民主政治在争取民心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责任。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政府“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30]，并在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赋予民主、自由等政治观念以制度形式和现实内容。作为抗战时期民主建设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予了人民以广泛的民主权利，动员边区人民积极参加抗战建国事业，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2. 经济改革激励。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积极推行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和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倡导婚姻自由，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在党报党刊上刊载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地方党委和政府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纳入工作日程，提高乡土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陕甘宁边区出版了《边区群众报》等“通俗小报”，并提出“在十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报”的宏

大计划^{[13][17]}。中共通过在乡村社会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从而领导一个大胆的,有创建性的解决农村的压迫和解体问题的运动,这正是‘延安道路’的特点”^[31]。“言行一致”的新闻宣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建构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蓝图和“青春光明”的延安形象。其通过根据地的民主改革实践,将党的意识形态优势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政治改革和乡村治理效能,赋予新闻宣传以“具身传播”的可感知性,人民“同意”因此成为由日常生活体验铸就的鲜活概念,激活了乡土社会参与政权建设的热情和动力。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2]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因应抗战建国的历史需要,创建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毛泽东思想,构建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宣传动员体系,在党报的底层渗透中成功地在乡土社会中确立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将报刊这个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变量”,改造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增量”,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了扎实的新闻舆论工作。诚然,在以武力为逻辑的民国政治中,中国革命胜利首先是军事胜利,但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国共作为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集团,必然会将战场延伸至媒介场域,以争夺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在军事胜利和政权转移的背后,是伴随中共意识形态权威而来的民意的强劲支持。

中共能够在乡土社会确立其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在于中共总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对新闻事业进行了“中国化”“群众化”改造。新闻传播模式的“在地化转变”,使传播链具有信息链、情感链、责任链和利益链等多重属性,建立了传受之间的强联结,从而在“人民喉舌”和“党的喉舌”的统一中,形成了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建设的“延安道路”,其在话语主体、话语渠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特色。其一,话语主体:具备通过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建设实现媒介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能力;拥有提供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外文明融通的新闻理论的能力;能够凭借“党

的喉舌”的党报定位以及“党管媒体”“思想改造”的新闻队伍建设,确保党的声音保真传播并扩散至乡土社会。其二,话语渠道:具备构建话语“割地”理性边界的能力,以及实现话语“搭场”底层渗透的能力。其三,话语内容:拥有定义新闻“真实性”的能力,以及建构“人民中心”职业伦理的能力。其四,话语对象:具备围绕“人民”展开论述并由此限定话语资格的能力,以及兑现新闻宣传承诺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陈明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2015(2):108.
- [3] 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J].近代史研究,2012(4):135-145.
- [4] 张丽.开在荆棘里的花:读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J].中国图书评论,2010(8):100.
- [5] 赵鼎新.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误区:兼谈中国社会科学困境[J].学术月刊,2024(12):204.
- [6] 郑师渠.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J].近代史研究,2022(6):70.
- [7] 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00.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2.
- [9]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84.
- [10]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11] 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79.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13]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 [14] 朱至刚.试论“有报之县”在近代中国的增长轨迹:侧重于对其动力机制的阐释[J].国际新闻界,2022,44(12):140-141.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2.
- [17] 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91.

(下转第25页)